三 颗 心

□彭学明

感谢高建国通过这本书，给我结结实实地上了一堂党性教育课、一堂人生教育课。我在书中不但重温了焦裕禄的故事，而且看到了以前没有看到过的焦裕禄的感人事迹，体会到了以焦裕禄为代表的兰考一大批干部的高尚节操，他们都给了我前所未有的感动。我边读边停下来扪心自问，我能做到吗？他们为什么能做到这样？所以说，这本书对我的灵魂、对我的精神世界，进行了一次洗礼式的净化。

在这本书里，我读到了三颗心。

第一颗心，是初心，即共产党人的初心。这个初心，就是共产党人的公仆心、赤子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祉的无怨无悔、无私无畏。这不是写焦裕禄一个人的传记，而是写焦裕禄精神的传记，因为这部作品塑造的不仅是焦裕禄这一个党的干部，而是以焦裕禄为主体的一群党的干部的形象。焦裕禄拖着病体跑遍兰考调研、治理“三害”的呕心沥血，焦裕禄把人民当父母、喊着爹叫着娘为人民服务的鞠躬尽瘁，都是焦裕禄精神的基础，是共产党人初心的基础。以穆青、张钦礼等为代表的干部，为了挖掘焦裕禄精神而大义凛然、挺身而出，可以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无私无畏、义薄云天和责任担当。作者对张钦礼、张申、刘俊生等一群干部的真实书写，从不同层面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对毛泽东、周恩来、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书写，虽然只是几个片段、几个细节，但都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初心。

第二颗心，是良心，即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良心和中国平民百姓的民族良心。这个政治良心，一是以焦裕禄等为代表的党的干部，为人民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政治良心。他们不掺杂半点私心，不为自己谋任何私利，一身清白地来到这个世界，又两袖清风地离开这个世界。焦裕禄作为一个县委书记，把自己的工资都用作访贫问苦，自己连一件棉衣、一件秋衣都买不起、穿不上，回老家探亲时连路费都没有。这种为人民服务的政治良心，实在令人为之动容。张钦礼的女儿想参军，他让孩子把机会让给农家后代，县委给他妻子提职，他从外地回来恳求县委收回成命，这些情节都让我感动。二是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政治良心。张钦礼在宣传焦裕禄时那种不畏权势、据理力争的铮铮铁骨，穆青在宣传焦裕禄时的光明磊落、上下奔忙，都是实事求是的政治良心的最好写照。

我们中国的平民百姓，更是有着本色的民族良心，这体现在他们对焦裕禄、张钦礼那种发自内心的爱和敬。焦裕禄、张钦礼深入人民之中、为人民服务，当百姓们自己吃糠咽菜，也要把讨来的“百家饭”给他们吃时，我看到了平民百姓的良心；当焦裕禄埋葬在郑州，兰考百姓悄悄前往哭坟时，焦裕禄迁葬兰考，数万人迎灵下跪恸哭时，我看到了平民百姓的良心；当张钦礼即将蒙冤入狱，几万平民百姓汇聚抗议、设法保护时，当张钦礼在施工现场要被带走，公社党委书记在工地上给张钦礼洗脚时，我看到了平民百姓的良心；当宣传焦裕禄遇到强大阻碍、有人昧着良心陷害忠良，兰考广大干部群众异口同声讲真话、说实话，一致说焦裕禄是人民的好书记、张钦礼是人民的好干部时，我看到了平民百姓的良心。这是中国平民百姓的民族良心。中国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人民公仆的政治良心、平民百姓的民族良心，才能走到今天并如此强大。

第三颗心，是民心。作者用大量的故事和细节，讲述了民心不可欺、民心不可违、民心不可辱，讲述了民心是最真实的心，民心是最可靠的心，民心是最伟大的心，深刻地昭示出，谁为人民而活，他就活在人民心里；谁把人民当父母，人民就尊敬和爱戴他。人民群众的口碑，就是共产党人的丰碑。书中通过焦裕禄迁葬兰考和张钦礼灵车还乡时十多万父老挥泪相迎的场面，展示了一幅震撼而美好的景象，体现了民心向背是决定兴衰成败的终极力量的历史逻辑。

《大河初心——焦裕禄精神诞生的风雨历程》通篇展示的这三颗心，带给我巨大的感动和震撼。这三颗心，每一颗都很宝贵、很有力、很动人，每一颗都需要我们坚守、传承和擦亮。掩卷沉思时，我会思考自己要怎样面对我的初心和良心，怎样用自己的初心、良心为人民服务，去符合民心、赢得民心。我们要通过对这本书的学习，来重温焦裕禄精神，重温党的初心使命。同时，我也希望专家学者都能够以自己的艺术良心和文学良知，来宣传和鼓励这部作品，让这部优秀作品得到应有的肯定和荣誉。这也是另外一种传承焦裕禄精神、向焦裕禄致敬、向像焦裕禄一样优秀的党的好干部致敬、向伟大而朴素的兰考人民致敬的方式。

大河式的人生和精神

□李朝全

高建国的长篇报告文学《大河初心——焦裕禄精神诞生的风雨历程》，是关于焦裕禄精神产生发展过程的翔实记录。作者采访踏实，写作扎实，内容结实。作品中水分很少，虽然也有一些抒情，但大都恰到好处，克服了报告文学作家喜欢滥发抒情的通病。书中引用了老作家柳青说过的一句话，作家要上三所学校：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作者无疑是深谙柳青前辈这种写作真谛的，明白作为一个作家尤其是纪实文学作家，首先要上好这三所学校，完成好这三方面的修炼。因此，这本书虽然不是“空前”之作，但有可能会是一部“绝后”之作，为焦裕禄及其精神的纪实性文学书写树立了一道标杆。

作品的题材和主题重大。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非常丰富，但其中以人物命名的精神并不多。这种特殊性，印证了焦裕禄及其精神书写的重要性。高建国在挖掘焦裕禄精神时，引用了焦裕禄用“三棵树”抒发人生理想抱负的自勉：要像松柏一样坚定不移、凌寒不凋；要像杨柳树一样插地成活，茁壮生长；还要像泡桐一样迅速成长，尽快成才。这，实际上是焦裕禄对自己人生目标和价值的比喻。习近平总书记在怀念焦裕禄的词《念奴娇·追思焦裕禄》里写道：“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焦裕禄当年为了防风固沙、帮助农民摆脱贫困，提倡种植泡桐。如今，兰考泡桐如海，当年焦裕禄和群众栽下的幼桐中的一棵，也已长成合抱大树，人们亲切地叫它“焦桐”。这，实质上就是树跟人的精神合二为一了，焦裕禄已然化为一棵大树，站立在那里。这可能是作家的一些很重要的独到发现。

《大河初心》书写了一段人生的长河，也写下了一段精神的长河。作品写的是焦裕禄完整的生平传记，真实可信，平凡却又超越，简单而又堪称伟大，深入爬梳了焦裕禄的前世今生，写下了焦裕禄精神的来龙去脉。在作家笔下，现实生活中的焦裕禄其实并非一个完美的人，而是一个还在成长完善的人。作者如实写到，开封地委报请河南省委任命焦裕禄为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开始省委是不同意的，后来同意他代理第二书记，一年两个月后才被正式任命为县委书记。这时，距焦裕禄去世只有几个月了。而就在焦裕禄去世前两天，省委还通报批评了兰考县委挪用救灾代食品顶换国家统销粮以补助干部的做法，要求县委做出深刻检讨，而且不点名地批评了县委主要领导同志。换言之，焦裕禄去世之前还受到上级批评。在作家笔下，真实的焦裕禄并不是一个“高大上”的人物。在20多名机关干部因病饿而死的压力面前，他在严格执行上级规定和从实际出发救助干部的选择中“走钢丝”，是非常难的。焦裕禄一辈子都是遵纪守法、循规蹈矩的好干部，但面对非正常死亡的干部，他做出那样一个艰难的决定，确实是很纠结的。高建国把这个情节如实地写下来，这样塑造出来的焦裕禄更为立体、真实。

习近平总书记说，文艺工作者要“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同样的，报告文学创作，特别是写一个正面人物，也应该努力塑造出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人物。这本书中的焦裕禄就是一位可信又可敬的人。他也是可爱的，包括在自己的亲人眼中。书中写到了焦裕禄的婚姻家庭，写到他和徐俊雅的恋爱，两个人相差10岁，徐母开始并不赞成他们的结合。后来两人走到一起，生了5个孩子。临终前几个月，焦裕禄最后一次回山东老家探望老母亲，一定要把几个孩子都带回去，让他们接受家风教育。这些感人的细节，印证了焦裕禄是一位非常好的父亲，虽然他可能有些“不近人情”，比如对子女要求得太严了一点，就连借用公家的扫帚回家扫院子都受到批评。书中写到，习近平总书记曾问焦裕禄的儿子焦国庆，当年“看白戏”的那个孩子就是你吧？可见这个细节给总书记留下了很深印象。作者笔下的焦裕禄是立体的、真实的、非常饱满的人物形象。

《大河初心》勇于直面问题和争议。对于宣传焦裕禄，其实从一开始有的领导同志就有不同意见，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在暴露兰考的阴暗面，兰考还这么落后，还有这么多盐碱地，还有这么多吃不饱饭的人，宣传焦裕禄，县里将面临多大压力！这些描写是很真实的。为官一地，领导肯定要综合考量，正反两方面都要考虑到，宣传好干部固然是好事，但不愿意自曝家丑似乎亦是人之常情。非常难能可贵的是，高建国创作中没有回避这些东西，史实是怎样就怎样写。包括宣传焦裕禄以后，他的亲密战友张钦礼几起几落的跌宕人生。这部作品围绕几十年来焦裕禄精神的宣传，把历史的曲折和风雨都如实地写出来，让人非常真实地看到了精神大河形成过程中的波澜，使人更加珍视党的精神谱系和精神血脉。

这部作品非常注重可读性。高建国在创作中注重故事和细节的挖掘与书写。58万字的篇幅，读下来并不疲倦，就在于作品中有很丰富的情节和细节，有栩栩如生的人物。比如，土生土长的县委通讯干事刘俊生，焦裕禄这个榜样被“发现”跟他是分不开的。新华社记者周原到兰考采访，刘俊生见面第一句话就说：俺兰考开展除“三害”斗争，把县委书记都活活累死了！这句开门见山的话，一下子把周原给镇住了，从而引发记者刨根问底，成了焦裕禄走向全国的起点。再如张钦礼，他在“文革”中犯有错误，是个盖棺未论定的人物，但他一直亲民爱民，是个清官、好官，是群众眼中焦裕禄最好的传人。他在治河工地被抓走时，公社干部端了两盆水，蹲下来哭着给他洗脚洗腿，几万群众挥泪相送。老百姓到监狱里去看望他，给他送吃的，给他下跪，他也跪下来。他在郑州病故，灵车返乡过兰考县城时，十多万农民拦车祭灵，让人唏嘘不已。这个人物跟焦裕禄一样饱满。这种人物的悲剧使得作品的文学性更强。

不一样的问题意识 不一样的广阔视野

□李云雷

《大河初心——焦裕禄精神诞生的风雨历程》是一本关于焦裕禄及其精神的集大成之作。刚开始拿到书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选题好像很普通，焦裕禄已经被写过这么多次，为什么作者还要再写一本焦裕禄？但是看的过程之中，我强烈地感觉到，高建国确实在采访写作上下了很大功夫，有跟穆青等人的通讯里不一样的问题意识和广阔视野。作者把焦裕禄放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里，放在民族精神的根脉和源流中，放在历史的、具体的人文环境里来书写，这就使得楷模的再现有了与其他同类作品迥然不同的格局与气象。作品的序章和尾声都写到黄河和东坝头，这一意象贯穿全书，不仅升华了作品的意境，而且很好地烘托了“大河初心”这一主题。

高建国作了三年艰苦、深入、扎实的调查，凡是焦裕禄走到的地方他都去过了，这简直就是做博士论文的方法：有一个特别好的选题，然后脚踏实地去探寻和研究，把材料搜集起来，最后用这样一种特别好的方式结构起来。正如几位老师说的，作品呈现出来的焦裕禄形象让人感到惊讶，作者把他担任县委书记时的另外一些情况，生动介绍和披露出来，这是本书有新意和能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要说的第二点，就是作品写焦裕禄在兰考深入实际调查、提振干部队伍军心士气、披肝沥胆带领群众根治“三害”的第三章，写发现和推出焦裕禄重大典型的第四章以及第五章开始几节，很好地解决了与穆青他们那篇通讯内容撞车的矛盾。如果把这本书跟穆青那个通讯比的话，关于兰考的部分内容其实是不占优势的，毕竟穆青的通讯发表得更早。兰考是焦裕禄精神迸发最为集中、最为强烈的地方，这段历史大家都很熟悉，对焦裕禄的兰考岁月既不能避而不写，又不能简单重复通讯的内容。作者用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在挖掘新内容、增添新细节来写好焦裕禄奉献兰考、根治“三害”、匡正风气、埋骨沙丘的同时，把通讯的采写和发表过程本身，作为书中正面书写的一项重要内容，以很大篇幅写了稿件的采访、送审、征求意见及发表的曲折过程，为读者打开了一个并不熟悉但又非常吸引人的阅读空间。就像作品副标题一样，既写焦裕禄，又写焦裕禄精神是怎么诞生的，通过焦裕禄本人的事迹，以及对他事迹报道过程的回放，使人所共知的老题材上新、出彩。

作品对焦裕禄通讯发表前后情况的层层披露，涉及《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当时一些领导的具体考虑与协调，包括彭真、吴冷西、李庄等，通过梳理这些史实，让我们了解到焦裕禄这个典型问世的经过。最后两章写焦裕禄精神是怎么传承的，以及如何利用文艺形式和更多新闻报道解读、传播焦裕禄精神。在这部十分厚重的作品中，作者抽丝剥茧，围绕焦裕禄精神的形成，给我们作出了最全面、最翔实的回答，确实有一个很好的整体性构思。作者用他扎实的功力，对这个选题做了很深入的挖掘，在用情、用力、用心写好焦裕禄的同时，还成功塑造了张钦礼等人的形象。客观地看，书中对反对宣传焦裕禄的地委某部部长跟县委主事领导的处理，是合适的，因为当时大家都不知道焦裕禄会成为这样一个典型，并且他们的反对也是有理由的。作品没有把那个部长标签化，而是写明他也是从延安来的老革命，对一些问题有自己独立的看法。这样处理，客观地把不同意见呈现出来，给读者以认识和判断的空间，也可以让他们更全面、更真实地了解焦裕禄精神形成过程中的一些波折。

最后我从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心理上，对焦裕禄精神的传播谈点认识。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很多神仙都是从人转化过来的，比如关羽，也是一个历史生活中真实的人，后来就转化成庙宇、绘画、小说、戏剧中的神祇形象。我觉得焦裕禄也是这样一个人，从书中可以看到，在兰考老百姓的心目中，焦裕禄和焦裕禄精神的化身“焦桐”，就是护佑苍生、扶正祛邪的“神”。穆青他们写的焦裕禄通讯等新闻报道，电影、电视和各个剧种的《焦裕禄》，包括赵树理没有写完的上党梆子剧《焦裕禄》，这么多艺术形式，加上老百姓口口相传，使得焦裕禄形象深入人心。这个形象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深深植根于大众文化心理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在焦裕禄精神继承与传播中发挥着独特作用。

《大河初心——焦裕禄精神诞生的风雨历程》研讨会发言选登

一部“动手动脚找东西”得来的作品

□王国平

读这部《大河初心——焦裕禄精神诞生的风雨历程》，对于我来说有点特别。作品的一个主体内容，是讲述穆青、冯健、周原这三位新闻前辈是如何挖掘和呈现焦裕禄这个典型人物的，体现出了他们高度的职业敏感、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可贵的精神品格。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从中感受到了强烈的职业教育意义。

按说这本书写得有点晚，因为焦裕禄和焦裕禄精神似乎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诠释。题材是老故事，人物是熟面孔，重新来书写，一般人会望而却步，因为“眼前有景道不得”。另外，现在的阅读在字数容量上走着极端，网络文学作品动辄几百万字，纸质图书以十多万字为宜。这部作品将近60万字，是个大部头，就纸质阅读而言构成一定的压力。但是，“好饭不怕晚”，而且“好书不怕长”。读这部作品，会发现这些老故事带给我们新的体验、呈现出了新的价值，人物给我们带来新感动、留下新震撼。作品通读下来并不觉得冗长，甚至还有意犹未尽之感。这是为什么？这就涉及到谁来写、如何写、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写、通过什么样的角度来写的问题。

作者高建国说，自己在十多岁的时候，读到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篇通讯，“对于铸造我人生基石影响甚巨”。亲近焦裕禄这个人物，是他的一个梦想。写这部作品的动因，是他受到了来自内心的某种指令，是一种内在精神力量的驱使。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部回望初心、追寻初心的作品。这个力量太强大了，也就是“我要写”的力量，一种强大的主动与自觉。因为有这样的渊源和来由，他的写作也就更用心、用情、用功、用力。作家在读懂焦裕禄上敢于下功夫，心怀敬意、富有情感。经过他的细心梳理，焦裕禄的形象变得立体而丰满。在我们的既定印象中，焦裕禄是人民勤务员，是朴实无华的好干部。读这本书，会发现他还是一个上过战场的人，是一个懂艺术的人，是一个善于进行宣传动员的人，是一个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人，也是一个受过委屈的人。这不禁让人感叹：“原来是这样的一个焦裕禄！”于是，我们对焦裕禄这个人的认识就更深了一层，对他更加敬仰、更感亲切。作家是从人的视角、人性的立场来看待焦裕禄的，突出人物的命运，突出人物在时代大潮中的起起伏伏，突出人物在起伏中始终保持着的信念的坚定。这部作品再度证明了一个道理：文学作品如果能真正关注人、聚焦人，展现人物的命运，表达人物的情感，就能吸引人、打动人。

我们以往在读纪实类作品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字里行间明明隐藏着一条很好的线索，但是作家回避了，没有进行深究，让人干着急：为什么不找这个人多问几句，为什么不到这个现场看看呢？读《大河初心》，惊叹的则是作家该去的现场都去了，该找的人都找了，甚至可能找不到的他也设法找到了。有所收获之时，高建国说或许是自己“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寻觅感动了上苍。这句诗出自白居易的《长恨歌》，下一句是“两处茫茫皆不见”。傅斯年曾经借用过来说考古，续上的一句是“动手动脚找东西”。可以说，高建国就甘于也善于“动手动脚找东西”，这是一部“动手动脚找东西”而得来的作品。

比如说寻找采访对象，他采访了焦裕禄爱人徐俊雅的弟媳王美玉、焦裕禄的侄媳妇赵心艾，在开封市尉氏县采访了曾追随父亲给焦裕禄治过病的中医专家杨培生的儿子杨文明。焦裕禄在尉氏县张市镇边岗村蹲过点，高建国到边岗村和尉氏县城找到原村团支部书记宋柳林和原村妇女主任李喜云了解情况。当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齐越播讲了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北京郊区农民王文华收听了，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给齐越写信，畅谈自己的感受，表达“要以实际行动来追念这位永垂不朽的好干部”。高建国找到王文华的女儿王彦，请她谈谈对父亲的印象。新闻界有个说法，叫“有请当事人”，这些人某种意义上还说不上是真正的当事人，是拐了几个弯的当事人，但高建国都把他们请到前台，诉说与焦裕禄有关的点点滴滴。正是因为这种创作精神，他能够有底气地在别人写的基础上“接着说”，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比如说，《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篇通讯，是根据焦裕禄当时面临三种考验，包括罕见的自然灾害、干部队伍中消极错误思想和自身严重疾病，层层递进、相互交织塑造焦裕禄英雄形象的。高建国根据焦裕禄主政兰考任县委书记一波三折的过程，提出还有第四种考验，即“岗位与职级的考验”。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发现，对于焦裕禄的形象不但没有损伤，反而更凸显出他忘我、无我的精神境界。